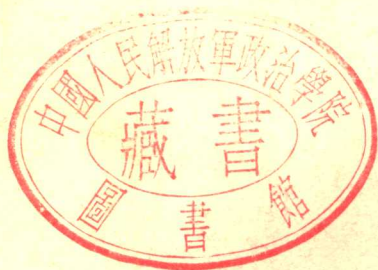


我在清水塘

史 瑞 芬 講
梅 汝 愷 記



江蘇人民出版社

書號：(錫)0073

我在清水塘

著者	梅汝璈
出版者	江蘇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7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 南京中山東路86號
印刷者	江蘇新華印刷廠 無錫南門外南禪寺

80,001—110,000(第6) 1953年2月

定價(甲一)3,200元

出版社的話

史瑞芬同志是溧陽縣清水塘村的小學教師，她自蘇南解放以後，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教育與領導下，曾在物質條件非常困難的環境中，用革命精神和密切聯繫羣衆的作風辦學；在短短的二年中間，創造了許多生動的模範事蹟，爲新中國的教育史寫下了光榮的一頁。

「我在清水塘」這本書，是作者根據史瑞芬同志本人的口述，把她的事蹟寫成報道，曾在蘇南日報上連續發表過。當全文在蘇南日報連續發表以後，我們曾接到許多讀者來信，建議把它印成單行本出版。

我們認爲：史瑞芬同志在教育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人民教師應有的高貴品質和辦學精神，是值得各地教育工作者向她學習的；把「我在清水塘」這本書出版出來，對推動當前的思想改造運動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我們特徵得作者同意，請他將原稿再加補充、整理，決定由本社負責出版。

現在，這本「我在清水塘」的小冊子終於在作者的努力下出版了。我們希望各

地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小學教師們，在這一次偉大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把這一本書作為學習的參考材料。從這本書裏所寫出的許多具體生動的模範事例中，對自己所啓發，從而確立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與密切聯系羣衆的工作作風。我們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湧現成千成萬的有高貴品質的優秀教師，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把新中國的人民教育事業辦得更好。

我們又認為：史瑞芬同志之所以有這些光輝的成就，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她自己在提高了政治認識之後，努力改造自己，忠心為人民服務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以及覺悟了的羣衆對她的幫助。這也就是說：只有在新的人民自己的國家裏，才能湧現出許多模範的人物，創造出無數光榮的業績。因此，我們又希望史瑞芬同志：在獲得了這些榮譽的時候，就要戒驕戒躁，再接再勵，防止自滿情緒的滋長；更要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緊密地團結羣衆，努力前進，才能永遠地保持和發揚已得的榮譽，才能為國家創造出更大的光榮成就！

蘇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

史瑞芬同志近影 ←



史瑞芬正和青年團溧陽縣委員會同志，在堤上散步，研究少年兒童工作。前面即清水塘村。↓



史瑞芬從蘇南學習回來，就辦起了一個民校，和農民們講解土地改革的道理。



史瑞芬在課餘的時候，經常到農民家裏幫助他們幹活，和羣衆生活打成一片，像一家人一樣。

史瑞芬帶着清水塘小學學生出外遠足。她利用這個機會，向學生進行愛勞動、愛科學的教育。



史瑞芬配合各項政治運動，在農民讀報組上讀報，宣傳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

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我拿着文教科的介紹信來到清水塘辦學。

清水塘是溧陽城西北角上的一個小村莊，離城只有三十里路，而我從家鄉——戴埠鎮動身，轉灣抹角，走上六十來里，才遠遠望見清水塘那座破祠堂的灰白粉牆。粉牆裏邊，便是我們今天住着的學校，粉牆外邊，有八十六家莊稼戶。

清水塘村莊不大，却窮得出名，附近的人談起來便說：「上有金莊，下有清水塘。」俏皮的人更說：「清水塘是塘好清水，怎奈魚蝦也存不住身。」

全莊的農田，合起來倒有千把畝；可是裏邊地主、公堂田却佔去六七成。解放前，這裏農民每年一畝田要交租一百五十斤，比起別處來，並不能算高。但是這裏的地勢很低，從「娃娃山」腳腳向東南，一脚低一脚，到清水塘一帶打住，形成一筐「鍋底田」，每逢夏、秋兩季，山洪一發，河床便攔在田上，大水大災，小水小災，地主、公堂田的租穀，却不管你怎樣歉收，硬是顆粒不讓。加上圩埂年久失修，地主和反動政府連眼也不張一張。計算從光緒三十二年到解放時為止，圩埂崩

塌已經有了七次。這裏上三四十歲的男女，大多數都能倒出一肚皮當年逃荒討飯的苦水。

記得我在離家的辰光，父親對我說：「清水塘是個苦地方，連年歉收，你先到那裏試試看，如果實在登不下去，就趕緊回來，家裏好醜也不缺你一口吃的。」我應着，但我還是踏上鋪滿青草的道路向前去，我再也沒回頭退一步。

我到的時候，清水塘的春荒正嚴重。前一年七月份颱風大雨漫了田，八、九月裏螟蟲又啃壞剩下來的稻稈。種田人收下來的糧食，過去該用囤囤的，現在改用了籬；該用籬裝的，改用了斗。種田人有的嘆「命苦」；懂道理的說：「災荒是國民黨和地主階級扎來的回馬槍」；婆娘們罵「菩薩沒睜開眼」；鄉、村幹部早在年前便領導大家生產救災。種田人三四個月，從冬菜吃到春菜，家菜吃到野菜，地下吃到樹上，我到的時候，有些人連榆樹皮也吃了。

我一到村裏，就拿着介紹信，去會見村長畢全麟。畢村長五十歲光景，個子看來還結實。他剛從田頭上回來，草鞋幫上還沾滿新翻的泥漬，身上覆着一層薄薄的塵土。我看他面容消瘦，只是眼睛裏還透滿精神。我們一見面以後，他就很高興地對我說：

「先生，你來得正好，孩子們的書給蛀蟲蛀也蛀爛了。」

他笑着，端條板凳要我坐下，接下去又說：

「春荒，春荒，萬不能讓孩子的書也給荒掉。」

他這簡短的幾句話，充滿着信心和毅力，無形中就給我上了一趟見面課。以後他又向我介紹了這裏過去辦學的情況，他說：

「國民黨時代，這裏也曾辦過一所小學，但沒辦出啥個名堂。先生來的來，去的去，一學期換一個，像走馬燈一樣。開學了，先生把家長找得來，學費收收清，不幾天鋪蓋一捲便走路。最後來了一個王章先生，有些羣衆替他起個諱名叫做『混世魔王』。他怎樣辦他的學校呢？他冬天晒太阳，夏天乘蔭涼。到羣衆家裏，便是要吃要喝，羣衆把他當個『先生』，他把自己當個『太爺』，學生請他上課，他回答說：『你們學費沒繳清，課倒曉得叫我上。』這麼一來，開學辰光，學生倒還不少，以後就越來越稀了。學生們三天來一天，六天來半天，課堂裏冷清清的，連老鼠在裏邊也瞞得着覺；而這位王先生呢？絲毫也不着急，樂得舒服舒服。羣衆反映說：『識字的先生，看不起我們窮人的孩子。你看，要孩子識幾個字，比麻雀生鵝蛋還難哩！』又有人說：『這樣貴重的先生，要是按上八字鬍子便算太爺了。我們

窮種田的，怎樣也供應不起。」

晚上，村長把我介紹住進李信開的家裏，喝了一頓大麥糊。喝大麥糊並不算一件苦事，因為我早已做了這樣的思想準備了。但我對於在這裏辦學的信心，却多少有些動搖。

我想：我在這裏辦學有兩種困難。第一，過去教師在這裏做事撒爛污，留下了惡劣的影響，羣衆對教師抱着成見，我來羣衆也不會歡迎；第二，這裏春荒苦不過，正是水乾魚盡的時候，肚皮吃不飽，學生那能定心讀書？而且當我從村長家裏出來的時候，就聽到個別的羣衆，在我背後噓噓說：「是一位女教師末，女教師只能帶帶小孩，怎麼能教書呢？」

夜裏，我思想鬥爭得很厲害。我問我自己：「我是誰派來的？」我由不得想起我接受任務的那一天，縣文教科姚科長在宣佈了我的職務以後，就握着我的手，要我好好幹！如今，激動的心情，還在我的心裏發燙，我不能忘記：我是人民政府派來的，在人民政府領導下的一切幹部，都應該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我不能像王章，王章的作風，是國民黨時代的壞作風；今天我可不同，我是人民的教師，國家交給我的任務，不光是要我張羅些板凳，弄些粉筆，漆個學校的招牌，而是要我全

心全意地培養下一代建設國家的人材。清水塘會不會出人材呢？完全能夠！只要我能堅持下去。

現在，清水塘確實很困難，可是困難嚇不倒英勇勤勞的人民，我們有希望、有辦法。人民政府領導生產救災，人們想辦法吃紅花草、榆樹皮，不只是爲了渡過災荒，留條活命，而是爲了在戰勝災荒以後，更好的發展生產，更好的參加祖國建設。災荒是暫時的，教育是長久的。老村長他看到了這一點。他是對的。我應該留下！留下！留下！我還要叫全村莊戶兄弟們知道：今天的「識字先生」不比過去的「識字先生」。勞動人民養活了我，我才能夠上學識字，我不能忘本，我應該爲勞動人民辦事。

二

我決心留在清水塘，對我說來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當我一到清水塘的時候，在那裏真是要啥沒啥。不說別的，學生沒有，黑板、檯凳不週全，連學校大門也沒有一塊；所有的，只是幾百個受餓的、和我這個知識分子不相熟識的種田人。但我

要留下。

我說我留下，要是沒有我的思想鬥爭，我留不下；有思想鬥爭，要是我不能戰勝自己的落後思想，我也留不下；但，要是沒有共產黨對我的教育，我根本就不能有思想鬥爭，也不可能戰勝自己落後的思想。在國民黨時代，如果是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事，要我幹，我想我準會搖搖頭，說：「讓我回去喝紅糙米粥吧！」

想想在解放前，我讀書，我是爲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才讀書的；我做工作，我是爲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生活才工作的。

我曾經讀了不少年數的書。從小學進到簡易師範，由簡易師範進到高級師範，又進到幼稚師範專科，最後在江西省立體育師範專科學校畢了業。記得在小時候，我常站在窗口，咬着手指對自己說：

「我呀！我應該發誓做一個工程師。」

但家裏窮，只好讀師範。以後我又對自己說：

「我呀！我應當有個獨立富強的祖國。」

誰不希望自己有個獨立富強的祖國呢？你也想，我也想，但我們什麼也不能有。拿我講，我沒有看到自己有什麼「祖國」，抗日戰爭期間，我却親眼看到日本

鬼子怎樣糟蹋了我們的家鄉，看到國民黨軍隊跑在鬼子的前面拚命敗退。而就在同時，我却受到了舊社會對於我的極端歧視。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難民學生，在國民黨後方逃亡流浪，從江西到貴州、到湖南、再到桂林。我做學生，買不起書讀；我做教師，教完了書，還被逼着替做「官太太」的同事倒馬桶。而當我最後一次想到：「我應當有一個溫暖的家」的時候，但和我結婚沒有多久的丈夫，嫌我不愛打扮，又不會交際而遺棄了我；等到我什麼也不想，單想團一羣學生，教一輩子的書，餬一口飯吃的時候，又找不到後台靠山，結果還是失業邇在家裏。

我對舊社會是恨的，但我沒有恨得跳起來要揍它；我對國民黨是仇視的，但我沒有勇氣站起來和它鬥爭。那時，我感覺到孤獨。

解放軍渡江的砲聲震天動地的響了。

我很難想像，這些砲聲投給了人們一種多麼大的力量！農民們把它比成二三月的春雷。我說：「什麼樣的雷聲下什麼樣的雨，聽聽這雷聲倒也不錯。」而地主盧鴻生一家，簡直顛倒得雞飛狗跳。遠處大砲聲，就像他屋頂上下冰雹，一轉眼盧鴻生溜走了。

那幾天，戴埠鎮前的大路上，滿眼看到的是從北方退下來的國民黨殘兵敗將。

一大團，一大羣，成團成羣的擠下來。農民把他們比成爲：六月天，毛坑裏的臭蛆蟲。

北方的砲聲一陣陣滾過來了。

記得是四月二十三日，戴埠鎮解放。早晨開門一看，那些東倒西歪的殘兵敗將什麼也不見，彷彿都給埋進泥土裏；而在天上，光芒四射的太陽，照耀着大隊的解放軍開過來。起初我對他們也感到陌生，但當我一接近了他們，我週身就生出了力量。

住在我家裏的有幾個解放軍同志。裏邊有一位中年人，是瘦瘦的臉，長長的個子，說話的聲音不響，但一字一句，很有份量。別人稱他叫做「政委同志」，我也跟着喊。

政委同志是一個滿好的人。在我看來，他是一個長官，但從他的身上，我看不出他有半點「長官的脾氣」。他一看到我們，就對我們說：

「老鄉們受苦了。」

他是北方人。我慌慌地回答他說：

「謝謝你！」

但下半句話我沒說出。人們的心理，當他在最最「感謝」的時候，往往是沒法說出自己的「感謝」的。在第二天晚上，我自己便忍不住對他說了。我說：

「政委同志！謝謝你們救了我們。我看到你們打垮了國民黨，心裏很開心。」他驚奇地笑着望我，他招呼我坐下。他輕輕地敲着桌面，笑着對我說：

「這一個家，是你的家。我從外邊來的是客人。我們是初相識的朋友。來，我們用朋友的身份來談談吧。」

我們談着，他問我過去，又問我現在，他揚着眉頭聽我的話，有時也插着問。我說：

「政委同志！我不知道怎麼想。你們沒來以前，我感覺孤獨；你們來了以後，我又覺得空虛。我知道，舊的是死亡了，什麼都是新的、好的，但是我不了解。」

他摸摸鬍鬚，笑笑說：

「不了解，不要緊！共產黨帶來的新世界，你慢慢地總可以了解它。但重要的是，你必須首先要下決心去接近它。」

他又說：

「孤獨對於你是有害的。一個人在黑暗中，心裏沒個方向，摸不着路，再想到

自己，想到自己的不幸，他就會感到孤獨。你看，我和所有的戰士們感覺孤獨麼？不！」

他笑笑又說：

「我和所有的戰士們都不孤獨。我們平時在一起像親兄弟，戰鬥起來像一個人，但我們却不是從一個娘胎裏生出來的，而是天南地北匯合在一起的。我們都願意走一條路——毛澤東的路。因此，我們是同志，我們是一個由毛澤東思想所武裝起來的、嚴密的、戰鬥組織。」

他又說：

「人生，就像走路一樣，走路的人，方向和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就如我們要行軍到你們的戴埠鎮，那怕是在夜晚，道路對於我們又是生疏的，然而我們每一個人一點也不慌亂。什麼原因呢？很簡單，因為我們一想到國民黨是我們的仇敵，一想到這裏的老百姓渴望着解放，那末每一個老百姓的面孔，對於我們說來，都是一盞盞明燈。我們的眼前便明亮了。」

我聽着他的話，身體一動也不想動。接着我聽他又說：

「你說你解放前也恨國民黨，可是你只看到你自己，如果你眼光放遠大一點，

你將會看到不止你一個人，而是成千成萬數也數不清的人都在恨國民黨，有的比你還要恨得深。那麼，你又怎樣看他們呢？」

「爲人民服務，就是你前進的道路。」他說。

我低頭沉思着，不完全懂。

最後，他站了起來，他又對我說：

「你不是學的師範麼？國民黨不需要你，但是將來——不，不是將來，而是現在，你對於我們人民却是非常需要的。在人民政府領導下，你可以爲人民辦學校。」

就這樣，我開始受到了黨的教育。

三

政委同志和我談的話，我句句記在心裏。我細細地回想一下過去。我說：的確，過去我對於自己，不是想得太少，而是想得過多。就譬如我對教育事業的看法吧！在過去，在我做學生的時代，我就曾經視它。當我坐在師範學校的課桌上，我